



重铸新时代文艺审美精神

□赵奎英

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全面开启了新征程,中国文艺创作也进入了新时代。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艺的发展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新时代也应有新时代的文艺。立足于当今的时代条件和现实问题,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重铸新时代的文艺审美精神,是时代交给我们艺术家的伟大使命。

生活理想与生活审美精神

新时代的文艺审美精神首先应该是一种生活审美精神,亦即一种植根于生活并指向人民的美好生活的文艺审美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艺术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表现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对人民美好生活的满足不仅要靠物质生产来实现,也要靠文化生产来实现。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创造美好生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方面无疑应该做出重要的贡献。

但我们发现,当今时代的有些文艺作品却并不能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它好像既不是来源于生活,也不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创造出来的。有西方艺术理论家曾指出:所谓“今日艺术”就是追问“什么是艺术”的艺术,就是探讨追问艺术概念本身的艺术。这种看法听起来有些极端,但的确提示出了包括中国当代艺术在内的今日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些当代艺术作品似乎压根儿就不关心艺术与现实、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人的关系,它们关心的似乎只是艺术与艺术自身的关系。法国哲学家巴尔特也曾提出“写作不及物”的理论,并从根本上否定存在着现实主义的作品。这种文学观、写作观同样也在 中国当代文学界得到某种呼应。这种倡导为写作而写作、为艺术而艺术,让文学艺术成为指向自身、追问自身的纯粹活动的做法,作为对那种让文艺完全沦为外部工具而失却了自身存在的反拨,并非没有合理的价值,但当文艺完全斩断与生活、与人的联系,成为只关 心自身的“反身代词”时,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是要走向枯竭死亡的。事实证明,古今中外的文艺都不可能只为它自身活着。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中曾经说:牡蛎要制造一颗完美的珍珠,需要一些物料,需要一颗砂粒或一块小东西,以便围绕着它形成珍珠。没有那样

中国新诗在这片雄鸡状的国土上生长、发育了100年。100年,经风历雨,寒来暑往,这棵大树何等巍峨。但仍有枝杈歪斜,有不尽人意之处。

当我们返身来路,评说这片诗歌的原野时,优劣成败,自由分说。不过有一点,诗歌固有的舒朗、平实的品质是始终坚守的,这种天然本真的素质,一直伴随诗歌一同成长。正言之,由于舒朗、平实,诗歌才扎根于民,传唱流芳,这片森林才愈发葱茏茂盛。

诗人是大地的歌者。诗人行走天然四季,身历春夏秋冬,人生百态,尽在心中。诗人歌赞友善爱情,抨击邪恶丑陋,指认光明与黑暗。诗人用鲜活清丽、富有哲理的诗句为人们输送温馨和幸福。诗人生活在底层,潜心打捞生活的智慧,以简洁明快的语言为人们打上记忆的烙印。

罗丕智诗集《天涯放歌》(大地出版社2017年版)悉数读来,感到一股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他经年历月地生活着,以乐观的心态、舒朗欢快的笔调,捕捉或归纳,集心志为诗行,吐纳世间风流。因之,阳光、乐观、向上,歌盛世,慷未来,有许多锦秀华章。美好的现实让他充盈耳,以至有许多事说不出口,“而我心事纵横,用大海的一个个深度不够,用大地的一百个高度还是不够。一支孤独的笔,痴望着我,倚坐无眠的窗口。”岁月给他留下

一个坚硬的核心,就可能长出一团不成形状的东西。艺术家如果要把他的形式感和色彩感结晶成完美的作品,也需要那样一个坚硬的核心,而这个坚硬的核心,就是社会赋予艺术家的“一桩明确的任务”。如果人们都只注意艺术家怎样把绘画或雕塑发展成为一种美好的艺术,竟至忘记给予艺术家较为明确的任务,艺术的发展就到了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时刻。艺术很可能就会堕入灰涩的无目标的探索。

因此,新时代的文艺在经历了对自身足够时间的探索之后,应该重建与生活的联系,关心社会提出的重大任务和重大问题,让文艺审美不仅仅是对文艺作品自身形式的审美,或不仅仅是对文艺概念自身的探索,它也应该把我们带向波澜壮阔纷纭复杂的生活和存在领域,激发我们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创造。文艺审美精神应该包含和灌注对存在的追问和对生活的理想。

宇宙境界与生态审美精神

新时代的文艺审美精神也应是一种生态审美精神。关心人民的美好生活的文艺,理应关心生态问题。我们知道,自然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生活的精神家园,人与自然是关系是最根本的生存关系,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都是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严重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根基。因此,植根于生活并指向人民美好生活的文艺审美,必须具有一种生态审美的精神,才能真正有利于人类的诗意美好生存。

继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十八大、十九大更坚定、更系统地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并且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由此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已是中华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生态生活的观念也必将日益深入人心,这也为人们的审美生活与生态生活的结合提供了可能。生态审美观不仅要渗透到日常生活审美之中,而且应该贯穿审美活动的所有领域。无论是自然环境审美、日常生活审美、科学技术审美,还是文学艺术审美,都应以生态审美观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指向。生态审美观因此也可以视作指导新时代文艺审美精神重铸的内在精神原则。

当今时代也被称作“后人类时代”。“后人类时代”,不只是说由于高科技的发展所导致的“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而且它还标志着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维方式,一种“接合各种独特宇宙与罕见的生命形式”的共在能力,一种包容差异,能对包含人类但

又不限于人类的所有存在者表现出更高尊重的伦理态度。西方以往的美学、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都习惯于从人类自身出发思考一切问题,中国现当代文艺、文艺理论由于受到西方哲学文化的影响,也表现出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征,因此新时代的中国文艺和文艺理论都应该进行全面的生态化重塑,使之具有一种宇宙天地境界和生态审美精神。

庄子《齐物论》中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冯友兰先生也曾经把人生境界分成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宇宙或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或“宇宙境界”是不讲道德,它只是扩展了道德关怀的范围,让一个人尽可能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达到一个更大的宇宙整体,让人类不仅仅为人类社会的利益做事,而且要为一个更大整体的利益,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种关怀整个宇宙的境界是一种最高的境界,这种关怀整个宇宙的道德是一种最大的道德,这种道德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伦理”。文艺的生态审美精神也即建立在生态伦理基础上、具有天地或宇宙境界的文艺审美精神。这意味着新时代文艺需要调整自己的思路,艺术家需要自觉地追求审美精神的生态化,并把这种生态精神浸入文艺创作之中。可喜的是,在实现审美精神生态化和弘扬生态审美方面,一些诗人、作家、艺术家早已开始了脚踏实地的行动。

天下胸怀与共同体审美精神

新时代的文艺审美精神还应是一种胸怀天下的人类共同体审美精神,或称“共同体审美精神”。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一直在构建和发展自己全方位的“天下观”,“乾坤”、“万国”、“四海之内”等词语,都具有哲学的、政治的、空间地理或境界意义上的“天下”含义。在日常交流中,“天下”通常指高于国家的人类普遍存在和普遍利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的天下观时强时弱,这往往与国家政治、经济的盛衰强弱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是国人与天下之间的一个中介,代表了一种力量和利益的边界,国力强盛,利益外溢,国人就会形成积极的开放型天下观,反之就会形成保守的内敛型天下观,正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虚弱的个体、民族和国家无法铸就一种雄壮的天下精神。中国文艺自《诗经》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起,就始终在以不同方式呼应着地理、政治、哲学、境界等等各个维度上的天下观,这使得中国文艺能够拥有一种大视野、大胸怀,造就了那种虽有高低强弱却绵延不绝的“天下话语”和“天下精神”。

平实是一种坚守

——罗丕智《天涯放歌》感言 □峭 岩

无病呻吟、扭捏作态玩弄语言技巧者满目皆是。华而不实的结果给我们唯一留下的记忆是“美丽的泡影”,是靠不住的。

有批评家在谈到诗歌写作的境界时曾说:“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恰恰点中了罗丕智的诗歌本质。他情动于衷,发于笔端为声,不造作,不矫情,一一道来,偶有警句妙语点缀其中,诗意豁然开朗,不能不说是他的内功。

目前,诗歌创作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由于经济的繁荣,物欲横流,导致人心浮躁,尤其是互联网的侵入,为我们开启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同时也搅乱了我们的正常思维。有的诗人不自觉地被俘虏,丢掉了诗歌的严肃性,投入掠奇写作,五花八门,标新立异。还有一大批诗人把个人化写作降格为小情小调的抒发,将诗异化为承载隐秘情感的器皿,而将关怀民族命运、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搁置起来。因而,我们的诗歌不能为转型期的国民提供灵魂诉求的食粮,不能为时代提供必要的精神向度。这是诗

人的悲哀。

雪莱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诗人要面对世界说话,面对大众说话,说真话,说中听的话。诗人的话是千锤百炼后的“镗”和“虹”,是大众能融会贯通的话,而不是胡言乱语。这就决定了诗人高尚、神圣的地位。

话又说回来,掠奇易,平实难。因为这两个概念来自两个不同的思想母体,掠奇是空洞的,没有根基的“雾态”,而平实则有雄厚的生活土壤。罗丕智的诗可贵之处就在于此。当我们耐心地一一读完后,自然就沉醉于他的平实无华、舒朗清美的诗风之中了。

汉代大诗家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是说对一首诗的理解各异,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那么,引伸开来,写诗自古就没有统一的技法,李白的浪漫、杜甫的写实、白居易的平易、李清照的委婉,各有其高妙。最后评判高低的标准,是诗的内核驱动力,是否打动了心境,是否至真至善至美。由此,我们肯定平实无华的诗歌品质,它依然值得坚守!

我们生活在一个平常的世界。周遭无非寻常之物。似乎这是一个诗意寥寥的生活时空。那么,到哪里去寻找诗意呢?

宗白华有一首诗:“啊,诗从何处寻?——/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在微风里,(/载)来流水音!/在蓝天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宗白华《诗·一》)(《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35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这首1922年发表的诗作,对“诗从何处寻”的问题,以诗人的方式做了回答。他的答案在“细雨”“微风”“蓝天”“孤星”等事物中。这些事物都是寻常之物,是不需要去远方就能获得的寻常之物,但也正是在这些寻常之物中蕴含着诗。可见,诗出平常。

—

平常生活、平常事物其实往往并不平常,在平常生活、平常事物中也往往蕴含着不平常。只是因为时光的磨砺、感觉的钝化,人们对这些平常的东西往往习焉不察、视而不见了。但在诗人看来,生活中的每一事物都是独特的,正如有人说过的,一棵树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独特,就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不可重复。因为独一无二,所以值得珍惜、关注;而当你珍惜、关注它的时候,你就很可能发现它的独一无二。这也就几近诗意了。诗人以其“多愁善感”,以其超常的敏感,能够从看起来平常的事物中发现不平常之处;并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顿时使寻常之物显示出新颖、奇异的光彩。冯至这样说里尔克:“他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物”,“一件件事物在他周围都像刚刚从上帝手里作成”。里尔克自己也说:“对于每个我们真实观看的物体,我们不是第一个人吗?”(参见叶朗《灵魂的在场》,载四月《四月的沉醉》,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诗人用新奇、关爱的眼睛看世界,世界上的事物就无不充满诗意的光辉。王国维说:“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特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人间词话》)那些能入诗人法眼的寻常事物和日常瞬间,无疑是幸运的,它们化为诗中情景交融的意象,成为永恒。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清代诗人袁枚这首《苔》诗因为“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山村教师梁俊和他的学生的吟唱而广为传诵。一种卑微而寻常的生命,被诗人的诗心所照亮,穿越200多年而仍能感动世人,这看起来有些奇妙,其实是文学艺术中的一个寻常现象:那些经典之作,哪一个不是千年之后仍能直击人心、温暖人心的呢!

二

人既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存在,也被日常生活所环绕。因为实际的接触和真切的感受,因为受到现实有限事物的束缚,因为愿望总是走在生活的前面,所以,日常生活往往是存在诸多缺憾的,往往是令人不满的,与现实的生活比起来,远方总是美的、总是充满诗意的。于是,有了对远方的向往。孔子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连从远方来的朋友都是那么令人快乐!到远方去,去寻找一种新的生活、一种诗意的生活。这当然是诗心的一种自觉,是对庸常的一种厌烦与逃离。但何处是远方呢?实际情况更可能是,远方并非“远方”。一些人不停地追逐着远方,几近流浪,似乎远方永远在远方,远方永远在路上。

好在还有另一种到达远方的路径。《世说新语》中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世说新语·任诞》);王荟说,“酒正自引人着胜地”(出处同上)。这里,酒使人“自远”、使人“着胜地”,也就是不用出门却能使人到达远方,一种精神的远方。陶渊明所说的“心远地自偏”,也就是从日常生活中超越出来,达到一种高远的精神境界。能从平常生活中发现新意、发现诗意,就是“自远”,就是“心远”。这是对平常、日常的超越,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兴”。人们更喜欢称这种状态为“闲”。清代李渔说:“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在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闲情偶寄》)可见,“闲”作为一种心灵对生活的超越状态、对世界的开放状态,能够发现平常生活中的诗意,化寻常之物为诗中意象。有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在这里,诗人发现,辛辛苦苦走了那么多的路,原来,自己所要寻找的美竟然不在远方,就在身边!这大约就是所谓“会心处不必在远”。

三

寻常之物最能打动诗人的、最能吸引诗人的是什么呢?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具有生意、生气、生趣,生命的东西,是与人具有相同属性的东西,也是与人最有关联、最能相通的地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等等诗作,所揭示、所呈现的也就是这种生命之间的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人们常常感慨道:“世界那么大,遇到你容易吗?”在这里,“我”与“你”的遇合确实是不容易,充满了偶然性因素,一系列的偶然性因素才促成了“我”与“你”的相遇,在这一系列的偶然性因素中缺少了任何一个因素,“我”就不可能遇到“你”,“你”也就不可能遇到“我”。所以,“我”遇到“你”或“你”遇到“我”,属于小概率事件。因为难得,因为好像是上天的某种有意安排,一个偶然的遇合便有了特别的意味。这个特别的意味,便是两个生命个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种偶然的遇合,又似乎是对必然性的一种超越,是对冷硬的物理法则的一种挣脱,给人带来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世上之物也因为这种生命的息息相关、休戚与共而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也即所谓“万物一体”。这种生命性、生命体之间的关联,往往成为寻常之物中诗人最为关注的方面,这也是最能动人的地方。基于人心相通的事实,我们可以说,与诗人相通的地方,也往往能与读者相通;打动诗人的地方,也往往能打动读者。

张世英先生认为“万物一体”之美是最高层次的美,并赋予这种美以神圣性。叶朗先生也十分赞赏这种“万物一体”之美,并认为这种美呈现出存在的终极意义。“万物一体”之美不必去远方寻找;从平常、从日常、从生活、从现实中就能体悟、体味到“万物一体”之美。叶朗先生这样评论诗人四月的诗集《四月的沉醉》:“四月的沉醉,是美的沉醉,是爱的沉醉,是沐浴在万物一体的阳光之下,体验它的无限意味和情趣,本真的存在伫立于色香声味的‘现在’,时间停止了,所有的意义在这一刻显现。//四月的沉醉,是生命的沉醉,是生命与存在相遇时灵魂的在场,存在的终极意义被心灵照亮。”(叶朗《灵魂的在场》,载四月《四月的沉醉》,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叶朗先生的这段话说的是《四月的沉醉》,但对那些直击人心的诗、那些感人至深的诗,也当可作如是观。



诗出平常

□王文革